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思想中的法国革命

JIN DAI XI FANG ZHENG ZHE XUE
SI XIANG ZHONG DE FA GUO GE MING

| 李福岩 著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思想中的法国革命

李福岩 著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李福岩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的法国革命 / 李福岩著 .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8

ISBN 978-7-205-08508-7

I . ①近 … II . ①李 … III . ①法国革命 — 研究

IV .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2679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 × 240mm

印 张：15

字 数：255千字

出版时间：2016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阎伟萍

装帧设计：高政华

责任校对：徐 玥

书 号：ISBN 978-7-205-08508-7

定 价：37.00元

目 录

总 序 / 杨路平 001

前 言 / 001

第一章 法国启蒙思想家与法国革命风暴 / 001

第一节 法国革命风暴前的社会状况分析 / 002

第二节 法国启蒙思想家对英国政治哲学的传播与转换 / 014

第三节 法国启蒙思想家内部的政治哲学论争 / 031

第二章 法国革命风暴期间政治哲学的激烈论争 / 062

第一节 柏克保守主义对法国革命风暴的激烈批判 / 062

第二节 潘恩对法国大革命政治原则的勇敢捍卫 / 085

第三章 法国自由主义对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 103

第一节 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深刻反思 / 103

第二节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深刻反思 / 120

第四章 德国古典哲学理性思辨进程中的法国革命运动 / 141

第一节 康德对法国大革命的抽象理性二元思辨 / 142

第二节 法国革命运动与费希特政治哲学的嬗变 / 167

第三节 法国革命运动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进程 / 181

结语 / 206

参考文献 / 208

后记 / 222

|第一章|

法国启蒙思想家与法国革命风暴

17～18世纪，法兰西王国的绝对君主制盛极而衰。在这个时期，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一直潜藏着封建王权高度集中、称霸战争、财政赤字、等级森严、政治腐败、思想蒙昧和文化专制的深刻危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在18世纪的法国逐渐崛起，并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迫切希望摆脱各种封建束缚，要求经济自由、政治权利与思想解放，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在18世纪末期，法国社会各种矛盾异常尖锐，财政改革与三级会议的失败表明法国社会各阶级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大革命最终在1789年7月14日爆发了。在革命风暴中，“君权神授”和“朕即国家”最终被“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和“第三等级就是一切”所彻底击败。这正应了路易十五曾说过的那句话：“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即使是路易十六仁慈与软弱的最后挣扎——“助朕一臂之力”^①，也没能挽回旧制度的彻底崩溃。

早在革命风暴到来之前，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在反王权专制、封建特权和宗教迫害的旗帜下集结起来，为1789年的政治革命做出了理论准备。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法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把英国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三权分立、自由、民主等政治哲学观念转换为反对法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原则。

法国启蒙思想家、革命的哲学家在反封建专制特权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同时，阵营内部也出现了理论的分歧，这个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卢梭与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启蒙运动主流哲学家之间的激烈论争上。革命前的法国思想界主要受英国政

^①1789年7月15日，路易十六在安抚和恳请“国民议会”代表时说过的一句话，表明了王权的彻底衰败与最后挣扎。

治哲学的深刻影响，卢梭激进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不占主导地位，属于少数派，受到启蒙思想主流的排挤与批评，承受着很大的理论痛苦。然而，这样一种激进的政治哲学理论，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却被革命的激进实践者一步步推上前台，成为法国大革命运动的理论旗帜。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一节 法国革命风暴前的社会状况分析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下王权的象征——巴士底狱，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然而，就在这一天，深居凡尔赛宫殿中的路易十六竟然并不知晓刚刚在巴黎城里发生的事情。和以往一样，他在狩猎日记上平淡无奇地写道：“14日，星期二，无事。”直到15日凌晨，这位法国皇帝才被革命暴动惊醒。他问叫醒他的利昂古尔公爵：“怎么，这不是造反吗？”利昂古尔公爵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直到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法国革命者推上断头台，他还是不能完全明白：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法兰西帝国何以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革命？这一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们。

200多年来，众多研究者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性质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一次偶然事件”“魔鬼在世间显灵”“一场阴谋”“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人革命”等。其中，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说法颇有见地。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绝非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中央集权、财政赤字、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改革措施不当、启蒙哲学等一系列复杂原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法国大革命也绝非魔鬼在世间显灵，而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是从以往事务中自动产生的。他说：“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①

^①[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0—241页。

一、法国革命风暴前的经济状况分析

17～18世纪，法国处于从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演变的社会历史时期，在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为了解决国家经济危机和财政赤字，法国封建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43～1715），财政总监科尔柏为增加贵族收入、扩大国家财源、加强王权，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由政府资助建立了一些手工工场和垄断贸易公司，使法国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路易十五（1715～1774）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1774～1789），为解决王国巨大的财政赤字问题，不得不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这一时期，法国工商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加快了，成为欧洲大陆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财产上超过了贵族，成为法国社会最富有的阶级，尤其是包税人、银行家等金融巨子，不仅个人财力雄厚，而且通过包税和放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到1788年年底巴黎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还有极少数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自由贵族，即资产阶级化的贵族。

在经济上，当时整个资产阶级的强烈愿望，就是摆脱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强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与盘剥，在一定程度上争得经济与贸易自由，保护私有财产。而随着专制王朝财政危机的日益加剧，它越来越加重了对金融界和工商界的盘剥与勒索。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法国逐渐展开，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革命时机进一步成熟。1715～1786年，法国税收总额从8600万锂提高到5.4亿锂，其中以间接税提高幅度最大。同时，由于法国资国内关卡林立，在各大城市还征收商品入市税，进而导致从法国南方到北方的货物价格提高十倍，严重阻碍了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路易十四时代科尔柏为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出口而制定的各种工业法规，到了18世纪已成为技术革新的障碍，但是仍被专制政府强制推行，用来敲诈制造商。专制政府对金融界也经常罚款和强行借款，而且动辄封闭银行，资金最雄厚的巴黎贴现银行就多次遭封闭，使富有的资产阶级遭受巨大财产损失。此外，由于法国资国债和国债利息的巨额增长，使银行很少将资金投入到工商业中去。封建王朝和贵族利用国家机器与特权巧取豪夺，大肆侵吞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令资产阶级愤懑异常。这一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资本主义商品经

济的发展与封建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成为法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冲破这些障碍，根本改变国家的性质，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法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在城市中出现了一批分散的手工工场工人、帮工和学徒，他们处于城市生活的最底层，被称为“无套裤汉”。他们的劳动时间每日长达14～16小时，工资微薄，生活状况十分艰苦，由于疾病、衰老和失业而时常流浪于街头。1786年，法国与英国缔结了贸易条约，法国大幅度降低了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税，造成英国的廉价商品大量涌入法国市场，使法国棉织品生产减缩、工场倒闭，失业者达20万之多。1789年由于英国竞争的影响，在巴黎有8万～10万工人落到无工资可领的地步。这些工人、帮工和学徒恶劣的生活状况决定了他们是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潜在的最激进力量和主力军之一。

美国学者摩尔说：“无套裤汉是革命的动力，而农民则成了决定革命能走多远的缰绳。”^①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小生产占绝对优势，大革命前夕，农业经济占国民收入的3/4。从总体来看，在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农村，土地占有极不平等，国王、贵族和教会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3，农民只占1/3。而只占有法国全部耕地1/3的农民，却是封建捐税、什一税和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正如美国学者摩尔所说，法国的波旁王朝，基本上是一个靠税收来榨取农民而生活的贵族王朝。农民在土地关系上依附封建领主。封建领主对农民的盘剥极为残酷，有的地租实行所谓“对分制”，攫取农民收入的一半；农民还要向封建领主缴纳各种名目的附加税。此外，农民还要向教会和国家缴纳什一税、财产税、人头税、二十取一税以及盐、酒、烟等间接税，服各种封建徭役。封建国家和教会的这种残酷压榨，严重摧残了农业经济，迫使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18世纪，法国农村普遍凋敝，许多农民弃家外逃，丰年满目疮痍，荒年饿殍遍地。从1662～1710年，法国发生三次饥荒，弄得民不聊生，有些地方竟然出现食尸的惨景。1777年，法国全境有10万名乞丐，一位目击者说法国贫苦农民“吃野草，啃树皮，像苍蝇一样地死亡”。1788年7月间，法国发生了严重的风雹灾害，农业歉收，粮价飞涨，副食品奇缺。“人祸”与天灾已使法国农民的生活处于绝境，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在即将发生的革命中，农民将成为推动革命前进最主要的、最激进的力量之一。对此，恩格斯指出：小农“这个阶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1789年的革命”^②。当代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敏锐地观察到：“1789年的

^①[美]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经济不景气更加恶化了农民的经济状况，面包价格达到了 100 年来的最高峰。这种物质上的贫穷状况与因等级大会召开而创造的机会凑在一起，为农民暴动的掀起火上加薪。在所有大革命中，农民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迅速和直接地改变无法忍受的物质条件；如有必要，甚至采用暴力达到这一目的。”^①

18 世纪法国农村还存在着农民分化，出现了较为富裕的农民阶层。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的需要量较以往有明显的增长。于是，在小农制的基础上，一部分条件优越的农民便通过租地或买地扩大经营，雇佣日工、短工，进行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与英国革命前的大农场经济相比，这只不过是一种小农式的资本主义。这种小农式的资本主义虽在全体农户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分布广、影响大，通常成为农村中的债权人，小农经济成为法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力量的主要代表。小农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不断冲击着法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表明 18 世纪法国农村和农业出现了全面的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国大革命将以比较民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18 世纪末，法国封建王权对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的盘剥和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及分配的极端不平等，直接推进了大革命时期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激进革命者对财产平等的追求，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并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主调——平等。如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非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而是由于改革消除了部分社会弊端与苦难，人们对剩余的社会弊端与苦难的感觉更敏锐而变得无法忍受了。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维诺克和米涅更揭示了法国社会贫富悬殊、分配不公与大革命之间的联系。维诺克说：1789 年的“法国是一个总体上说富裕起来的社会，当然贫富十分悬殊”^②。米涅说：“分配的不公平，使得法国社会上的弊病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人民备受专制压迫与社会不平等之苦。”^③

二、法国革命风暴前的政治状况分析

大革命前的法国在许多方面是旧贵族绝对君主制的典型国家，以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对内残酷压榨，对外战争不断，社会政治日趋腐败没落。法国社会三个

^①[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4 页。

^②[法]维诺克：《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侯贵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5 页。

^③[法]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6 页。

等级的严格划分进一步加剧了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第一、第二、第三等级不能像英国那样与贵族分享统治权。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和社会等级结构的这些特点决定了18世纪末期法国社会的转型不能像英国那样以较和平的方式进行。摩尔说：“法国的基本社会结构与英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因此不可能走英国18、19世纪所走过的和平变革的道路。”^①关于这一点，我国学者阎孟伟也分析指出：“欧洲封建社会末期，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一般都存在着三种政治力量，即王权的力量、诸侯的力量和市民阶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力量。社会革命的具体方式或途径和实际结果取决于这三种力量的消长。在英国，这三种力量大致平衡，形成了相互制约的政治局面。……在法国，封建王权的力量几经反复，到了17世纪变得十分强大，并建立起绝对君主专制制度。这种绝对君主制决定了法国资本主义结构不能和平地取代封建社会结构，其结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以疾风暴雨式的武装斗争彻底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②

从15世纪末叶开始，法国就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绝对君主制达到鼎盛状态。当1643年五岁的路易十四登上法王王位的时候，海峡彼岸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步胜利鼓舞了法王权反对派。1648年5月，巴黎法院贵族官僚集团仿效英国议会，通过了扩大自己权力的决议，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反对、限制专制王权的愿望，得到了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法院贵族、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王权的“投石党”运动被红衣主教马扎然首相镇压后，法国的封建专制进一步强化了。米涅说：“投石党之乱是贵族政治的最后一个战役。在路易十四时期，君主专制终于建立起来，并在无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从路易十四到革命爆发，法国的政体不仅是专制的而且是横暴的。”^③1715年，路易十四不任命首相而亲自管理朝政，国王的权威达到了顶点。他修建了豪华的凡尔赛宫，并把大贵族从领地迁到那里居住，从而剥夺了他们的实权。他还剥夺了法院对国王敕令的异议权，将“法律出于我”和“朕即国家”作为加强王权的理论根据。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只要在有国王签字的“密札”上填上要逮捕人的名字，就可以予以逮捕，并可以无限期地关押在皇家监狱——巴士底狱里。

^①[美]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张东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②阎孟伟：《论社会有机体的性质、结构与动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232页。

^③[法]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页。

为争夺欧洲霸权，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不断进行对外战争，直接导致了法兰西帝国巨大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位 54 年，打了 31 年仗，使国家财政逐渐被掏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政府财政赤字竟达 25 亿锂。1715 年，他死时国家已民穷财尽。路易十五继续进行对外战争，屡遭挫败，特别是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被英国打得一塌糊涂，失去了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塞内加尔和在印度的许多殖民地。到路易十五统治末年，法国财政已陷于破产的边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路易十六王朝，为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又消耗军费 20 亿锂，为此而大量举债，雪上加霜地盘剥国民。1784 年时，国债利息达 1.25 亿锂，1789 年又提高 2 倍。

18 世纪法国专制王朝和贵族已非常腐朽了，尤其是宫廷贵族集团更成为整个贵族腐败的缩影。国内政治腐败和凡尔赛宫的挥霍无度，使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宫廷和封建贵族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宫廷的耗费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国王的御前人员达一万四五千人之多，每年要花费 4 千万至 5 千万锂。路易十五醉生梦死地说：“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表达了特权等级的悲观没落情绪，也反映了专制制度的危机。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王后玛丽·安东尼为人轻浮、生活奢侈、挥金如土，使得国家财政更加拮据不堪，人称“赤字夫人”。到 1789 年，法国政府已欠债达 45 亿锂。这就使路易十六希望实行税制改革来解决财政问题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法国封建专制的又一典型特征是等级森严，整个民族被分成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分出许多阶层。18 世纪，法国明文规定第一等级为僧侣，包括修士和修女在内的黑衣僧和高级教士白衣僧，约为 13 万，享有特权，不纳国税。僧侣等级又分成收入丰厚的主教、大修道院院长和穷苦的布道传教者两个阶层。在经济上，僧侣“占有全王国中十分之一左右的土地，土地收入每年达八千万以致一亿锂，此外还有一亿二千万锂的什一税”。在政治上，第一等级是“有自己的行政组织，而且有自己的法庭的等级”^①。法国的高级僧侣和贵族一样过着奢侈的生活，一些高级僧侣在政府中身居要职，与宫廷贵族紧密勾结、相互利用，共同维护着封建专制。第二等级为贵族，免缴绝大部分捐税。贵族分为宫廷贵族、暴发户贵族、穿袍贵族和地主贵族四类。国王、王后和这两个等级是社会的寄生虫，

^①[法]索布尔：《法国革命》，端木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3—4 页。

享有各种特权而不承担或极少承担国家赋税。第三等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和金融贵族即资产阶级中的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为生的资产阶级——法律工作者、文学家、艺术家、医生，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等。第三等级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却承担着国家的赋税。

伴随着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三个等级之间、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在18世纪后期达到了顶点。第三等级和前两个等级的矛盾异常尖锐，阶级间的矛盾斗争和革命的爆发已是不可避免。维诺克说：大革命前的法国是“两个互相仇视的社会，两个‘种族’——贵族与平民”^①。在文人、哲学家和资本家领导下的第三等级迫切要求政治权利，以至大革命前夕经西耶斯之口喊出了：“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②

大革命前，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资产阶级为首第三等级同以国王为代表的僧侣、贵族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占据了社会的首要位置，但在政治上，他们仍属于被压迫的第三等级，他们强烈要求平等参政的自由和权利。在路易十四时代之前，法国富有资产阶级中间有些人曾用金钱捐买贵族头衔，成为所谓的“穿袍贵族”，并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但原有的那些靠传统门第存身立命的“佩剑贵族”对这些没有根基的“暴发户”极为歧视，根本不承认他们享有贵族地位，并竭力反对王室的鬻官政策。1614～1615年的三级会议，贵族等级的130名代表完全由“佩剑贵族”组成，而177名穿袍贵族仍然只能充任第三等级的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和世袭旧贵族实际上已成为两个互相敌视的阵营。而且路易十四即位以后，实行了一系列反资产阶级的政治与宗教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他宣布，凡是花钱买来的贵族头衔一律作废，这就完全堵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进身之路。为加强天主教的统治，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赦令》，迫害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教胡格诺教派，造成胡格诺派教徒大量外逃，给法国的经济、技术等带来重大损失，也招致了欧洲新教国家对法国的敌视。封建王朝、贵族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打击新兴的资产阶级，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与当时正在向世界第一强国发展的英国很不相同。在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化和贵族资产阶级化的程度都很高，等级正在消失，贵族与平民在从事同样的职业，他们的子女相互通婚。而在法国，贵族自我封闭状况

^①[法]维诺克：《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侯贵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②[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页。

十分突出，法国资产阶级贵族化和贵族资产阶级化的程度都很低，贵族和资产阶级相互仇视，很难在政治上达成妥协。美国学者拉斯韦尔说：“十八世纪末期，新兴资产阶级与法国贵族阶级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是在其他地方这个新兴资产阶级却很快地与日渐衰落的贵族阶级熔为一体。”^①

第三等级的最底层是城市“无套裤汉”和乡村农民，他们是后来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和主力军。第三等级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受压榨最深，他们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大革命前夕，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市平民和乡村农民时常为生存而起义、暴动，不断冲击着封建王权的基础。“从1788年11月以来，各省督抚都写信给大臣说，要去镇压一切叛乱，已经办不到了。把这些暴动分开来说，便都不十分重要；但合拢起来，实足以摇动国家的根本。”^②这如同后来亨廷顿所分析的那样：“农村若能支持政治体系和政府，政治体系本身就可以稳如泰山地对付革命的冲击，政府也就会有希望在叛乱的威胁下，固若金汤。一旦农村充当反对派的角色，政治体系和政府就都有被颠覆的危险。”^③

法国资产阶级虽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如果沒有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和配合，它很难实现自身对政治自由与权利的迫切要求。因此，资产阶级只得联合城乡广大劳动群众进行反封建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贵族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④

法国封建专制王朝还造成了社会等级内部各阶层以及人们相互间的疏离、矛盾与仇视。随着王权在18世纪末期的衰落，贵族和僧侣这两个等级逐渐操纵了全部国家事务，使封建专制统治上层也发生了政治矛盾与危机。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路易十六为人宽厚，生性怯懦。在他统治时期，纳税的第三等级对封建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昂，但保守派贵族顽固地拒绝任何改革。路易十六为解决国库空虚曾试图实行改革，先后任命杜尔阁和内克为财政总监实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但他们的改革由于损害了贵族利益，遭到顽固贵族的反对而失败。在路易十六的支持下，继内克之后的两位财政总监卡隆和布里埃纳在税收方面出台了一些新政策，要求特权等级也要纳税，遭到贵族和僧侣的反对，最终也失败了。这表明，专制王权已衰落，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政治危机。与此同时，第三等级内部也存在着大资产阶级与城市工人、平民之间的

^① [美]拉斯韦尔：《政治学》，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页。

^② [俄]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史》，杨人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③ [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矛盾冲突。1789年4月，巴黎发生了“雷韦荣事件”。糊墙纸业工厂主雷韦荣借口销售困难，宣布降低工资，还辱骂工人：“工人们只能吃些黑面包和扁豆，小麦不是为他们种的。”这些话激怒了劳苦群众，导致3000多劳苦群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消灭财主！消灭贵族！国王万岁！内克万岁！”等口号，捣毁了雷韦荣的工厂和住宅。这表明当时社会各等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十分复杂，也预示着在未来的革命过程中各革命派别也会冲突重重。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为解决巨额财政赤字问题而被迫召开已停开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成了法国社会各等级、各阶层矛盾的聚焦点。路易十六把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增加了一倍，即由原定的300名增加到600名，希望利用三级会议征收新税、解决财政困难和摆脱危机。贵族和僧侣中的保守派希望利用三级会议的旧时表决方法，否决国王向特权等级征税的方案。一些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僧侣和贵族希望借助三级会议实行政治革新，达到君主立宪之目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多半是资产阶级，他们大多希望废除封建特权，减轻赋税，实行贸易自由。整个资产阶级都希望颁布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主张法国实行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城市无套裤汉和乡村农民没有自己的代表，但他们希望三级会议能减轻捐税，降低物价，提高工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备受法国各等级、各阶层关注的三级会议，在封建统治危机四伏且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刻召开，对于满怀各自期望的法国社会各等级、各阶层来说，是注定要失败的，正如米涅所说：“三级会议只不过是将业已成熟的革命公布于世而已。”^①

三、法国革命风暴前的思想状况分析

在18世纪，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神支柱仍然是天主教神学。天主教会1700余个修道院遍布法国各地，它除了对全社会进行经济压榨和政治压迫以外，还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严密地控制着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这种宗教专制主义，加倍制造社会苦难，使本来就无法调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矛盾更加尖锐。对此，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在专制国家里，宗教的影响比什么都大。它是恐怖之再加恐怖”^②。伴随着绝对君主制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在法国的封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发生

^①[法]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1页。

^②[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2页。

了深刻的危机。

天主教会在法国掌握着知识活动的最高原则，神学的原则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教会教条就是政治信条，《圣经》中的词句在各法庭中具有法律的效力。天主教会中的一些高级僧侣和封建贵族紧密勾结、相互利用，共同维护着封建专制制度。一方面，天主教会竭力为专制制度辩护，以“君权神授论”为封建王权涂洒灵光圣水。天主教会依据《圣经》和圣徒的“言行录”颁发了无数教义、教规，严密控制着官方舆论工具，大肆传播“天启”“神迹”，以束缚人们的思想，支配社会的文化生活。天主教会还竭力推行蒙昧主义，鼓吹“原罪”“灵魂不死”和“来世生活论”，要人们忍受现世的苦难以换取来世的幸福，愚蒙、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另一方面，专制政府也充分利用天主教会为自己的政权服务，专制政府把宗教教义视为国家法律，曾颁布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严禁攻击教会和朝政，违者要处以极刑。作为法国国教的天主教为强化宗教专制，还设立专门的宗教裁判所、法庭和监狱，对新教胡格诺派教徒和其他不同信仰者实施残酷的宗教迫害，制造了许多震惊世人的惨案。1766年，德拉巴尔骑士被诬告未向出丧行列脱帽，被认为是亵渎宗教，被处以火刑含冤去世。大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里，宗教文化专制主义几近疯狂，竟公然声称：“为了教会的最高荣誉，一切手段都是好的。”1759年，天主教会因达到禁止百科全书继续出版的目的而狂喜，专门铸造了一块纪念奖牌，牌上刻有十字架踩躏地球仪和科学书籍的图样，并题字：“被踩躏的无神论者的虚伪和智慧”。

从16世纪天主教对巴黎异教徒大肆杀戮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到17世纪路易十四取消“南特赦令”而对新教徒的镇压，再到18世纪法国天主教这种思想专制统治与迫害，我们可以看到，新兴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对待宗教问题上，不可能像德国那样通过宗教改革来摆脱宗教专制，也不能像英国那样将教权纳入王权的控制范围，因为在法国的专制制度中，宗教的统治和王权的统治紧密地勾连在一起。这就可以理解，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无神论”为什么能够在“自然神论”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到18世纪末期，法国资产阶级抛开宗教的“外衣”进行纯粹政治形式的大革命，并且在革命过程中暂时消灭了宗教。这些都是与法国天主教的专制迫害密切相关的。

法国天主教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但伴随着近代欧洲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的发展、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展开和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及英国启蒙思想在法国的传播，法国封建专制和天主教

会在思想文化领域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遭到当时法国社会思想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这也使得法国专制统治“在经济、政治领域之外，又面临思想文化领域的尖锐斗争和深刻危机，而且这一危机是促使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直接起因”^①。

法国在18世纪掀起的启蒙运动，集中攻击天主教神学这个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对于反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起到了动员群众和推动革命前进的积极作用。以培尔、梅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积极吸收、传播和转换英国启蒙思想、政治哲学，对现存宗教和国家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们以人权对王权，以人道对神道，以理性对迷信，成为人们与封建专制进行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他们的著作拿到国外出版，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进巴士底狱。18世纪中叶，以《百科全书》编辑出版为标志，法国启蒙运动进入高潮。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科学技术书籍出版居上风，占出版物总数的40%，文学作品与此相仿，二者合在一起超过80%，有关宗教著作的数字急剧下降。1787年以来，印刷品空前繁荣，1788年7月至9月出版的小册子多达300余种。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俄国作家克鲁泡特金说：“巴黎正在吞食那些革命的小册子，每天总有十册，十二册，或二十册出版，并且很快地有些人买了送给那些最穷的人。人民很热烈地讨论雪耶的《什么是第三等级》。”^② 法国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科学、理性、自由、平等和人权等启蒙思想在法国的传播，孕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观念，加速了革命风暴的到来。

与在大学校园里、书斋中进行纯粹理性思考的德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不同，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同时又是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特别关注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富有现实性与战斗性。他们活跃于剧院、沙龙和咖啡馆，以文学、戏剧等多种灵活形式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易于为法国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使抽象的理论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力量。对此，托克维尔说，18世纪法国哲学已深入到大众中，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抽象理论竟变成闲者日常聊天的话题，连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法国社会“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

^① 李凤鸣，姚介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② [俄]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史》，杨人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